**哭 聖校**

莊萬壽(前北一女禮班國文老師、台師大國文系教授、台師大台文所創所所長、長榮大學名譽講授教授)

　　五月二日下午，老牽手匆促的電話，「鍾聖校病逝！」我簡直聽不懂這句話。農曆年前，她還買了水餃、蘋果來，離去時，依樣叮嚀我們生活處處要小心。

三月中我倆趁手腳還伶俐，赴日本東北五日行，19日在青森寄給她一張風景明信片，因為容易記得她「國北師」的地址，返台後，沒有去電聯絡，卻傳來不可思議「肺癌」、「中風」的致命噩耗。我忍不住為這五十年的學生、朋友、親人滴下了眼淚。

　　1968年秋，北一女高一禮班的國文課教室中，我講課時，大家都俯首看書，有一生卻常仰首挺立，雙目有神，這樣的學生，我馬上記住她的姓名；她作文也很好，說話流暢，理路分明，我選她參加全校演講比賽，終於「鍾聖校第一名」，名不脛而走。

　　高一快結束，我師大研究所畢業，留校當講師，當時面臨很大的抉擇，是要繼續兼課嗎？由於與學生情感很好，尤其我當時追求自由的思想，期待給第一流的高中生有啟蒙的作用，因此我下決心兼兩年的課，將禮班帶到畢業。然而高一下，學生也要文理分班，禮班是理科班，聖校和許多優秀的同學，被分出到其他的文科班。我與聖校的師生緣，其實僅僅高一一年而已。

　　大學她考進師大教育系，教育系是培養行政人員的搖籃，教書要選輔系科目，少數則從事學術研究，那麼好學敏思的聖校，我料定她自己要走學術之途。當時我住師大路口，距師大很近，她經常來看我，並教老大阿農的注音符號，讓孩子快樂的得了第一名，她成了阿農的入門師，阿農從小學、初高中、大學到出國，都存有鍾姐姐的恩情。

　　聖校畢業後在仁愛國中教英語實習後，旋考入本校教育研究所，由碩士而博士；1980年取得碩士學位後，即擔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的助教、1984年升為講師。1988年以《結構性科學探討的教學理論與應用》論文得博士學位。同年任初等教育系副教授；2008年以心理諮商學系教授職位退休並繼續兼課迄今。碩大的學術根柢，在自由講學的校園中，迅速的成長。

　　1990年她以科學教育的論文，得到學術界頗高的嘉新文教基金會獎。記得那一天我盛裝出席儀式。她的研究是有關情意教學、認知心理學、老人心理學，論文專書不斷累積，我雖不懂，但一向強調一個大學教授，若學術不能領先，就沒有教育理念的發言權，更何況是專業的領域。

　　從她當老師後，就經常來往我家，與師母、小孩，宛如一家人，尤其過年過節一定來看我們。我在師大國文系所對送禮請客的封建惡習，深惡痛決，她常人在樓下才打電話，要我們開門。我終於用禮尚往來，來平衡。數十年來她像家裡的妹妹、女兒回家一樣，充滿溫馨。我快八十了，還有這樣親如己出，來給你心理輔導，講笑話，說生活的人生，這是何等的幸福！

　　我叛逆性的思想歷程，聖校知之甚明，在高中三年的教學，我是自由的社會主義者，還是毛澤東的粉絲，文革中期，轉變棄中親台的社會主義者，解戒後，開始在報章大肆發表政論。聖校也開始教書了，知道我反國民黨的立場，她娘家、夫家是廣東望族，隨蔣來台，她能獨立思考後，願與這位異端的老師交往，是我的幸運。談馬克思主義，談今日中共已是黨國的帝國主義，我拋棄中共，就是見證。台灣住民落地生根，要走自己的路，她似乎聽進去了；我當台教會會長，在電視遊行，她亦以平常心處之。

　　聖校的婚姻大事，是當初人人讚賞的金童玉女，對方是同班的才子，又通哲學、音樂，公公是留法的教育家，曾任師大三民主義所所長。他為人勤快圓融，我在師大人文中心請他開「西洋音樂欣賞」，頗受學生的好評。他留於師大，很快的升到教授，解嚴後，我曾向聖校打趣說：「妳先生的論文，怎麼還在寫『蔣公』呢？」

　　情感的驟變，她斷絕了師友的往來，痛不欲生，幾年的煎熬，皈依上帝，找到了歸宿，恢復了過去的達觀和自信。然而是心靈的不夠解脫，抑是上帝的命定，她也從來沒有怨言；最後卻罹重病而自不知，豈止令我扼腕嘆息。至少再留二十年的光陰，她依然可以拎著書、水壺，到處溜達，在公園看書，與同學、教友聊天，到那一天，我倆走不動時，也等期她來問個寒暄。

聖校！妳不該走，走得太快了！

去年禮班走了林伶紅，今年又走了鍾聖校，脆弱的我心，那堪……(2917.5.12)